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



王三慶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典範集成·文學 8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 日本典藏

王三慶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王三慶著。——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103.9
面；公分。——（典範集成·文學；8）

ISBN 978-957-17-2211-5（精裝）

1. 敦煌學 2. 文獻 3. 日本

797.9

103017197

典範集成·文學8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

作者 王三慶

發行人 高本釗

責任編輯 高文彥

出版者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萬華區雙園街96號

Tel: (02)2306-4629 Fax: (02)2302-3870

（業務部）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20號8樓

Tel: (02)2341-5293 Fax: (02)2356-8076

郵政劃撥 新文豐出版公司 01004426

電腦排版 柏羽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民103）年9月初版

基價 精裝 13.2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649號

ISBN 978-957-17-2211-5（精裝）

81000426（精）

<http://www.swfc.com.tw>

e-mail: swfc@swfc.com.tw

凡有缺頁或破損者，請寄回更換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中日文化交流史簡述	2
第二節 寫作的動機與目的	9
第二章 日本天理圖書館典藏敦煌寫卷之價值及其爭議	17
第一節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典藏之敦煌寫卷	18
第二節 敦煌研究院藏品張大千先生題署的〈景雲二年張君義勛告身〉	50
第三節 敦煌文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佚名注本再探——以天理大學圖書館イ183-293爲中心	67
第三章 中國書儀文獻在日本的藏製及發展	125
第一節 故宮藏本《唐人十二月相聞書》研究	126
第二節 敦煌本《朋友書儀》一卷研究	145
第三節 《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月儀書〉的研究	201
第四節 《杜家立成雜書要略》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254
第五節 月儀書《婦人寐寤艷簡集》研究	264

第四章 敦煌文獻與日本佛教、民俗的呼應	309
第一節 《敦煌變文集》〈下女夫詞〉的整理兼論其 與「咒願文壹本」、「障車文」、「驅儼文」、 「上梁文」之關涉問題	310
第二節 驅儼與上梁一義之轉及其風俗之在國外	370
第三節 敦煌文獻北圖藏本 7677 (夜 98) 《咒食施 一切面然餓鬼飲食水法》研究	387
第四節 敦煌應用文書啓請文研究	402
第五章 東土與西域文獻的緊密交織——敦煌文 獻與日本古寫經典	425
第一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傳本及其價值 考論	426
第二節 《文場秀句》之發現、整理與研究	455
第三節 從《聖武天皇雜集》的整理研究兼論其與敦 煌文獻之關涉	485
第六章 結 論	521
參考書目	527
書後跋語	555

第一章

緒論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正文內容，文字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其為多段落的敘述性文字。）

第一節 中日文化交流史簡述

位於中國東方，陸路可以連通的韓國，傳說商末紂王時，箕子披髮佯狂，已經到達該地；可是一水之隔的日本，卻要到了秦始皇派遣徐福帶領五百童男童女出海，追求那莫虛有的神仙靈藥，才有了交流的契機。歷史告訴我們，文化的交流模式不外是自己國家出現了暴政與動亂，才迫使內部的百姓為著脫離苦海，背負著家當尋求一個安全理想的未來，而語言文化自然也隨著人類的移動足跡而駐紮當地。對當地而言，這種遷徙即是文化交流與相互輸入的開始，也是舊有文化的變質與新文化產生的動力。另一種輸出方式則是帶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以誇耀或壓迫的模式輸出，希望不費一兵一卒，能讓對方主動臣服；或者威嚇對方，因聲威而自動來獻。《後漢書》記載武帝滅了朝鮮之後，倭國使驛來通者三十許國，即是一例。不過這種被動式的輸出或輸入，絕對不能持之於久長，它常隨著雙方政治的變動而有所消長。

然而另外一種獨特的輸入模式，則非被動式的外來或受迫性的屈服，它是主動積極進取的追求與一種自覺反省的內部需要，隋唐以後日本派遣大量的使節團和明治期間送出大量的歐美留學生即是極為明顯的例子。這些學者到了當地，常常是有計劃、有意志的為其本國攜回十分重要，有益經國濟世的重要文物和無形的智慧財產，畢竟形而上的文化所能體現的唯有這些形而下的器物罷了。當然也有雙方因利當頭，以商業行為交易下各取所需的方式。

從《古事記》(712 A.D.¹)或《日本書紀》(720)上的記載，中國古文獻之傳入日本，是由王仁從百濟帶來《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展開序幕²。隋唐以後，因海運的開通，中日兩國來往益加的密切，以迄唐昭宗景福年間(894)，從日本先後派出了二次的遣隋使和十九次的遣唐使，每次伴隨而來的多達數百人，其中有留學生、和尚、百工和其它人士。這些人縱然沒有哥倫布般的橫渡大西洋，卻也需要同樣擠在狹小的船艙中冒著生命的危險，漂流於海上，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極為出色的貢獻。如武后長安年間(701~703)，「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文。」隨行者山上憶良即是著名的《萬葉集》作者之一；或第八次遣唐使隨來的吉備真備皆為史上著名人物，而玄昉、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仁、惠遠、圓真、宗睿等僧人所攜回的文物更多達五千多卷，其中除了經、史、子、集傳統的四部載籍外，更有為數不少的佛教經典。今天我們在日本公私立圖書館或寺廟中看到有關奈良、平安朝時期的古本佛典寫經和一些中國載籍，大都是這個時期的遺留舊物，或者是當時的過錄抄本及這批人的再製文物。

¹ 以下凡括符內數字，皆指西元後年號，不再加註 A.D.，以省篇幅。

² 三慶案：此說日本學界未成定論，據市川本太郎《日本漢文學史概說》(東京：東洋學術研究會，昭和 44[1969]年 4 月，第 13 頁)以為此《論語》版本為何晏《集解》；島田重禮、久保天隨則以為是鄭玄《注》。至於《千字文》，岡田正之《日本漢文學史》(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 8[1996]年 10 月，第 7-8 頁)指出千字文議論者多，谷川士清、木村正辭、岡田正之等或以為鍾繇作，新井白石、島田重禮等則以為如《凡將篇》、《急就章》之類的小學書而被誤記者。

當然，有部分是中國僧人或商人媒介過去的，如有名的佛教大師鑑真和尚在天寶十二年（753）東渡成功，隨行所攜帶的除了佛典外，也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真蹟或醫籍本草等，而仁壽年間（851）逝世的藤原岳守，也因職務上的關係，在抄檢唐人的貨物中，居然得到了《元白詩筆》。

這類輸入與輸出的彙聚結果，在日本仁和、寬平年間（885~897），藤原佐世奉敕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曾經有過約略的反應，內容凡分「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異說」、「小學」、「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罰」、「雜傳」、「土地」、「譜系」、「簿錄」、「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五行」、「醫方」、「楚辭」、「別集」、「總集」等四十大類，共計 1579 部，16790 卷，偶或穿插少數日本自作的典籍，但是不影響整體大觀，何況這還是冷然院焚火之餘，而且也不包括自中國輸入之佛教經典。再者，如果把各寺院及民間收藏的東西也計算在內，恐怕不止倍數，只是無從統計而已。³ 這些隋唐時代引進的文物對於日本奈良、平安時代，上至於國家的典章制度，下至於社會風俗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此在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文學研究》、木宮泰彥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及專家學者的篇章中都有詳細的論述，我們不再贅言。只是目前日本收藏的中國文物有一部分

³ 日本學界近年深入各寺院調查所藏文物，頗有斬獲，其成果已陸續印行或發表。

還是這時期傳入的東西，而被視作國家重要文化財，珍藏於公私立博物館或圖書館中，也有的成爲高野山寺、東大寺等各寺廟的鎮山寶物。

到了宋代，遣唐使雖然終止，但是隋唐以來開通的海運及設立的幾處市舶司，使民間的貿易交通仍然維持往來的狀態。尤其雕版技術的進步對於文物的傳播，不再受到手工抄錄時一筆一畫、一紙一書的限制，這等大批量產的結果，擴大了書市的規模，促使書籍的成本價格下降，文物的取得也更爲容易，智慧財產的交流變成輕便攜帶與容易傳播的形式，在在促使無形的文化或有形的文物邁向了市場經濟，內銷與外銷也就兼而有之。所以在一些文人或法師的日記中，常常可以看到宋版書籍的傳入，甚至進入了宮中。如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東大寺的法濟大師周然等飄然渡海，除了回饋中國早已失傳的《鄭玄注本》和任希古撰的《孝經新義》第十五各一卷外，同時也帶回一部開封太平興國寺雕印的開寶《大藏經》，這是我們今天所見最早傳入宋版書的記錄。此後不久的長元二年（1029）四月，藤原賴通在大中臣輔親官邸也見到了獻給天皇的《玉篇》和《白氏文集》。再者當時的中國商人往往也以宋版新雕本作為禮品贈送日本士人，時人並以摺本爲貴。這段期間輸入與輸出的結果，在平安時代末期成書的《通獻入道書目》與正平年間（1353）大道一從編纂的《普門院經論章疏語儒書目錄》二書，都有詳細的著錄，可說是研究宋元時期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重要記錄。這些傳入的典籍有的至今猶完好的保存在圖書館中，而商務印書館印行海內外善本《四部叢刊》時，有些還是遠從日本拍攝回

來。甚至鎌倉時期（1192~1336）傳入的慶元版《太平御覽》、《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古籍都是中國久已佚失的珍貴版本，而在日本都還保存十分完好，誠然不易。

其後，日本歷史進入了南北朝與戰國時代的室町階段（1192~1336），招聘來自江浙閩越一帶的雕版印刷業者及工人，開始翻刻中國的古書，著名的五山版即是此一純熟技術下的產物，雖然仍有不少日本的使者來求新書，尤其中國儒家新變下的「宋學」或「道學」，對於皇室帝位的維持有其迫切的需要，促使朱子學在日本有了極為重要的發展。另外有關律令、醫書與佛教信仰等也有其實際的需要，因而源源不斷地輸入日本。

明朝萬曆中期以後，日本脫離鎖國時代，政經文化交流也出現比較重大的突破與發展，而古籍的傳入除了透過兩方來往的使節團外，民間人士的交流十分頻繁，更有船載大量的販運。當時中國船舶停靠的貿易港，每年多達兩百餘艘，少也幾十艘以上。這些番號船舶除了運來民生貨物之外，也攜帶了不少的中國古籍和文物，束裝成箱，每箱套數部種雖有不同，然而以文化十二年（1815）南京船永茂號貨物報單登錄，共載書 15 箱、32 種、260 部、622 套，若以此為計，約可算出一年間輸入日本的書籍數量。而當時刻書中心的南京、杭州和福建建陽等地，透過南京、寧波、泉州等優良港灣，每每成為文化輸出日本長崎的對話窗口。這些記錄的第一手資料都分見於《賚來書目》、《大意書》、《書籍之帳》、《落札帳》等文獻中，經過關西大學大庭脩的整理研究後，刊行在《船載書目》。

統計江戶時期長崎港輸入的文化商品少說也有 7893 種，而以非商品名義輸入的載籍還不計其數，足見輸入量之大。也因如此，元祿元年（1688）的田中清兵衛還開設了一家專門販售中國書籍的「唐本屋」，把它店中的商品編成一本《唐本目錄》，共收錄了中國古籍 1099 種，可見書店規模已非小可。當我們在為北京中華書局編輯《古本小說叢刊》時，自日本拍攝不少的東西，其中有一部分是這時傳輸進來的；而王秋桂為臺灣學生書局編輯《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時，特地委託我代為蒐集的幾部書，也是這個時期的商品；甚至陳慶浩編集的豔情作品《思無邪彙寶》，其中大半都是日本各圖書館珍藏的海內外孤本，並且以這個階段輸入的佔大多數。

今天我們只要走訪日本的正倉院、石山寺、真福寺、東福寺等地，其保存的中國古抄本都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唐宋舊抄本，而足利官學與金澤文庫更收藏了不少的宋板雕本，內閣文庫與宮內廳書陵部收藏的大量漢籍來源更是德川氏建置的紅葉山文庫的舊藏。恰好呈現日本有意輸入中國文物幾個階段的特色與藏品，這些東西都是舊日輸入的存餘。

可是這麼大量而珍貴的文物，在修《四庫全書》之時，除了從日本回收了一批如《皇侃義疏》等文獻外，還有不少的載籍未被利用。直到晚清之際，中外交流往來非比尋常，雙方也互派大使駐紮，從第一任公使（1877.1~1881.12）何如璋（1828~1891）及其參贊黃遵憲等人的開透視野，建立了人際網絡；復經黎世昌（1837~1899）的接手第二任（1882.1~1884.11），以及董康等的訪書襄助，除了收購明治年間被掃地出門的漢籍外，更刊行了《黎氏古逸叢書》，其中

盡是中國亡佚的古籍或異本。民國以後，更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的編印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刊行，其中更不乏日本珍藏的中國古佚本漢籍，而坊間書肆或學者的研究也零星收羅了不少珍貴的典籍或異本，足見這千餘年來交流的結果，告訴了我們「禮失而求之於野」的古訓，並指示著我們研究時的一盞明燈。

第二節 寫作的動機與目的

誠如上述所論，經過百多年來學者辛苦的收羅和翻閱，此中秘寶並未全然公之於世，對於外國學者而言，仍然一知半解；對於日本國內學者縱使知道存有這些載籍，也未必能夠順利的入手閱讀，也因如此，其中需要探索尋訪及加以利用者仍然不少。由於筆者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閱讀了姜亮夫之《敦煌瀛涯韻輯》及潘師石禪（重規）之《敦煌瀛涯韻輯新編》，粗略了解此方知識，而有志於是類文獻之探索。其後，潘先生回到國內執教，幸能叨陪末座，聊附驥尾。於是特請友人自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購回敦煌文獻等相關文物，擬以此作為研究課題。惟先生斯時趣味於《紅樓夢》，而筆者又因年齡癡長，受命帶領學弟妹從事讀書會一職，整理《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紅樓夢》一書，於是成就了《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紅樓夢》整理校本及博士論文《紅樓夢版本研究》一書，而與初衷相違。其後，先生開始講授「敦煌學」，每年暑假伊始，立即束裝赴歐，歸來後則面授心得發現，喜形於色，溢於言表。

於是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便從事有關此方文獻之研究，並從類書一項進行探討，進而涉及整理敦煌文獻所有分類之書，如書儀文獻及齋會文獻等。斯時筆者又因有感於西歐從煤鋼資源的掠取，歷經兩次的世界大戰，使得英、法、德數國由盛而衰。美國因為遠離戰火而保泰持盈，成為一等強國；戰後的日本又以經濟力量達到二戰時期所想而不能達到的輝煌成就，在在促使法德兩國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整合歐洲，

破除貿易關稅的壁壘，以與美日進行經濟抗衡，終於有了歐盟經濟體的誕生。除了歐元的統一之外，更有歐洲政治議會，可說完全植基於拉丁文化觀點下的整合。那東亞又如何能夠與美歐諸經濟體相抗衡？能否立足於漢字文化圈的觀點下，互相了解各國與漢文化的受容情況，整合東亞各國的貨幣及貿易關稅，則是筆者當時思考之問題。也因如此，一面整理《敦煌類書》文獻及進行相關研究外，並從事於域外漢文小說的整理；並完成《越南漢文小說》第一輯，且由行政院新聞局頒贈「金鼎獎」的榮譽。

然而，越南漢文小說只是這一整理工作的初步，對於日本漢文小說的相關文獻則全然一無所知。時筆者為著擺脫系主任的職位，於是透過學校的交換轉赴日本執教一年，一則蒐集日本漢文小說的相關文獻，另一方面也瞭解如火如荼發展的日本敦煌學，並蒐集關於敦煌文獻及研究篇章。此後，又利用休假時間，專程再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三個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七個月，及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所一個月。數年來除了完成《日本漢文小說》第一輯外，本書蒐集的文章盡是這些年來利用此方材料撰寫的研究成果，由於埋頭於多方研究工作，無暇彙集成書，直到臨將退休之際，不得不進行收網，檢視多年隻身在外的辛勞，也向拙荊作一成績交代，隻身在外並非盡是遊山萬水，也無眠花宿柳；更向補助經費的諸多單位證明，至少還有一丁點的成績可以交差。

其實，本書乃赴日執教，以迄今日，未曾收錄在專書中與日本關涉的重要篇章。緒論除了說明著作的緣起及各章節

重點外，結論則為全書的攏絡收結，並透過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這一主題的貫串，分成如下四章的論述：

第二章起先從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品作為討論重點，第一節鳥瞰天理圖書館敦煌藏品的全貌，探討其學術價值與英、法、大陸及俄等各國館藏寫本之比較；另一點討論國畫大師張大千於敦煌莫高窟作畫時獲取的數件文物，在裝裱後賣到日本的過程及其學術價值。第二節則分析出自張大千之手販售，而回歸敦煌研究院的〈景雲二年張君義告身〉可能是件贗品，這也是當年日本學者遲疑不買的原因。儘管此一說法大陸學者多持異議，然而當年國際敦煌學會議上舌辯群儒，並希望敦煌研究院能夠將張君義的頭骨與手指腕，連同此一藏卷送給有關單位檢驗 DNA 的呼籲，至今遲遲未能實現，不免感到些許的遺憾。第三節則是以敦煌非十七號洞窟出土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本為研究重點，這是探討道光二十七年（1827）前，敦煌塔出土的文物《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本的相關研究，除了說明本卷內容的特殊性外，也與同時代的諸多敦煌寫本相互呼應。再者，敦煌文物除了十七號洞窟出土的藏品外，也有張大千或俄羅斯學者在莫高窟其他洞窟挖掘的文物；更有十七號洞窟未開啓前的七十三年，早有精彩的《心經》註本已為敦煌學拉開了序幕。該卷又有許乃普等人的題跋，歷經太平軍亂及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每年春節元日必拿出誦唸，並記載上朝所見的皇帝身體狀況，同時也見證了中朝大臣遭受列強各國環伺下的束手無策，在近代史也有其重要性。至於題跋者盡是嘉慶、道光、咸豐、同治以來著名的書法名家，勿論原卷書跡或者後人題

識，都有書法真品之藝術價值，售出者則為近代史上名人盛宣懷之後代及臺灣板橋林家老三熊光（字朗庵，1897~1971）之手，整體流傳過程可說是這部寫卷生命史的呈現。

第三章則從日本二玄社影印中山博物院典藏的清故宮文物談起，追溯其自唐以來歷經宋元明流傳上石的源流脈絡，其後原本又再入藏清宮，並缺失了一部分，幸有明代上石的拓本可以補實內容。次節則是敦煌文獻《朋友書儀》十多個寫卷的整理研究，探討敦煌英、法、俄諸多寫本的綴合與校勘，乍看之下似與日本無關，然而勿論最先提起本卷的日本學者，或本章上下節之內容，都相關涉。第三節是以《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月令》卷之整理校勘及唐本「月儀書」之比較作為研究重點，除將亂次的殘片給予序整，並提出內容在輯佚與校勘上的價值外，更將以上三節月儀的文本作一比較，探討四言賦體與四六駢文體式不同的月儀形式，而且該類應用文書有可能歷經各個時代積累彙抄的結果。至於第四節則探討月儀書對日本的影響，從平安朝（794~1192）的《明衡往來》、《季綱往來》、《東山往來》、《續東山往來》、《西郊往來》、《菅丞相往來》、《釋氏往來》⁴，歷經鎌倉時代（1192~1333）則有《貴嶺問答》、《十二月往來》、《山密往來》、《新十二月往來》、《消息詞》……以迄吉野（1334~1476）、室町（1477~1573）、安土桃山（1574~1602），下至江戶期間（1603~1867）及還政於明治以後，此類作品仍然多所製作，通計而言，凡有三千餘種，其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然而日

⁴ 此書又名《明衡消息》、《雲州往來》、《雲州消息》。